

在线学习将延续至高校开学以后,这位DIY慕课六年的大学教授告诉你——

# 在线教育内容为王,无需变身“主播”

随着各高校启动返校复学工作,高校的在线教学仍然会继续存在一段时间。在线教育在诞生之初曾被寄予希望会改变教育,但是在疫情到来之前,在线教育并未如诞生之初设想的,成为各所高校教学的重要部分,甚至时常面临是否有存在价值的争议。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赵斌DIY了慕课六年,他的“极简版”网课是喜马拉雅、超星等网络平台的网红课,最近他更是尝试在抖音上进行最精简的知识传播。六年网络授课中,他对网络教学中的一些问题,逐渐有了自己的答案——

■赵斌

2013年,慕课首次声势浩大地进入中国,并引发关注。其后,教育界谈论虽多,但推广并不好,真正愿意从教育本身出发,投身其中

进行教育模式改革的教师数量有限,大部分教师依然习惯于传统的教学形式,利用网络工具进行教学改革始终处于“雷声大、雨点小”的尴尬。直到今年,突如其来的疫情使得

所有课程只能通过网络进行。那么,慕课,以及翻转课堂,从不愿意用到不得不用,从不会用到熟悉掌握,也许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逐步体会到网络教学的好处,从而改变自己之前的想法。

## 传统课堂积累了学生的差距

大多数人知道网络课堂是因为可汗学院。2004年时孟加拉裔美国人萨尔曼·可汗(Salman Amin Khan)帮他的侄女远程辅导数学,当时他用一个廉价的手写平板电脑,通过雅虎的Doodle Notepad开始了最早的网络教育。

可以料想,他刚开始使用这些工具网络教学时,进展并不好。侄女总感到他的监督和评判是巨大的压力。随后,萨尔曼考虑改变策略,帮助小侄女卸下心理包袱,让她掌握自己的学习进度,允许她随时让他暂停、重讲。侄女很快就掌握了原来难以理解的知识点,并在数学摸底考试中取得了优异成绩。

这一经历让可汗认识到:给学生创造一个安全、私人、舒适且能引发思考的氛围很重要,课程的进度也应该按学生的需求来制定,而不是统一进度。这次成功让他的许多朋友慕名而来,请他给孩子辅导数学。果然,经他辅导的学生,数学成绩都得到明显提升。

他通过Skype同时辅导三四个学生,进度非常缓慢,因为学生理解有快慢,还会遇到不同的问题,需要不时停下来解决。所以,他就干脆把课做成了视频,放到互联网上,让所有的孩子都按照自己的时间计划观看视

频,自己掌握学习进度。

其实,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课程内容只学一次远远不够。传统课堂根本做不到,但是网络教学却非常容易。另外,他的视频很简单:一个黑色的写字板,一边讲解一边涂写,这就是全部。

2006年,萨尔曼创立了可汗学院(Khan Academy)。现在,美国的很多数学老师都非常依赖它,也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翻转课堂。

萨尔曼·可汗的故事告诉我们,教学模式必须重构。传统教学模式,

以教为主,学生们被要求以统一固定的进度来学习同一个主题,然后在固定的时间进行评估。学生的成绩自然有好有坏,虽然评估出了差距,却没有相应的弥补措施,最后这些差距不断积累。

我们一直在提倡以学为主,目前正好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困难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要与传统作战,与习惯作战。我们需要改革的是让学生能随时随地学习自己没明白的课程,对落下的课程采取补救措施,直到他们熟练掌握,并继续前进。



## 互联网拒绝繁琐

六年前,我开始自己做网课。至今,都有很多老师表示不解,他们觉得没必要,浪费时间。而我做网课只是因为我认为,网络教学适应我们的时代,尤其是它有着传统课堂不可替代的功能。

一个新生事物具备某些优点,虽然不完善,但选择一定是权衡利弊之后的综合考量。我相信传统课堂也有不可替代的优点,但客观思考,可能更多是习惯,而非真的更好!

很多人担心自己做不好慕课,从我的经验来看,主要是因为对陌生事物的恐惧。那么在做慕课中,有什么值得注意的问题呢?

首先是表现形式。萨尔曼从不做

那些花里胡哨的课程,他分享的都是最简单朴素的课程,主要目的是分享他的思考过程,但因为足够生动、简单,能让孩子在短短五到十分钟就掌握一个知识点,所以在互联网上引起了很大的关注——互联网拒绝繁琐。

大家大可不必担心形式不够好,如果课程的内容足够好,学生不会关注具体的形式;如果内容不好,学生才会话痨表现。但是如何表达,年轻人往往更有表现力,许多网络主播成功的案例也值得我们学习。

也许进入中国后,很多学校为了鼓励老师做慕课,以课题形式打包。课题经费不菲,少则几万,多则上百万,然后委托专业公司制作。专业公

司在拍摄过程中,虽然要求专业,但不接地气,各种策划,各种效果,最后还有各种剪辑,总之就是按照电视台主播的方式来拍摄的。一下子弄得门槛很高,让许多老师望而却步。

我一直提倡“内容为王”。我自己的课程都是DIY的,拍摄地点就是我的办公室。为了提高信息传递密度,内容一定要进行剪辑,这也是为了节省学生的时间。45分钟的课堂,拍摄成视频大约是15-20分钟,这对学生学习来说,比课堂要高得多。现在许多平台都提供了快速播放的功能,那么有些学生就可以利用该功能更快地学习。而对于有些学生,如果觉得内容有难度,可以反复多看几遍。

## 真正以学为中心,需要多种教学形式配合

为了让大家更方便地理解视频内容,我制作视频课程都增加了字幕。不管用什么方法教学,最重要的是要让学习者学习起来更方便。讲课的目的,本来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听明白我们讲话的全部内容,然后能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更有成效的讨论。

让学有余力的同学获得更丰富的知识,还可以考虑借鉴其他的相关视频和教学内容。国外有许多优秀视频教学内容,可以经过一定的处理后分享给学习者。考虑到并非所有人都能灵活运用英语,所以我增加了双语字幕,目的依然是希望大家能理解素

材的内容。

以学为中心,如果没有配套的教学内容,其实很容易变成一句空话。我一直希望找到一个好方法,让学生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学习。比如,以多种方式和形式发布学习素材。我的课程通过教学平台发布视频和测试题,通过微信发布图文课件——将视频中讲的每一句话变成文字,在喜马拉雅听书发布语音,这样就可方便学生在各种场景下学习。如果不想看书,直接学习视频课程;如果身处嘈杂环境(比如地铁、食堂),可以看字幕;如果想快

速学习,可以直接看微信图文版中的文字。我今年还在准备尝试一个更有挑战性的事儿,在抖音上快速讲解重要知识点,以学生喜欢的方式言简意赅地传授一个知识,充分体现以学为中心。

有了网络课程,有了手机课堂,我想有关手机是否能进课堂的争议不再是一个问题了吧。正如北京大学张颢武教授所说,手机正成为人体的一个新器官,是小孩到了高中以后长出来的一个器官。从我自己的网络教学实践来看,80%左右的学生会选择使用手机来学习网络课程。

## 碎片化的知识,不值得吐槽,也许是时代给我们的馈赠

有些网络课程就是直接录播上课的内容,让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还有些课程,只有简单知识点的讲授,让许多老师对知识的系统性产生了怀疑,被归为碎片化知识,甚至受到诟病。但是,碎片化知识通过连续的新鲜内容,不断刺激你的大脑,让你始终处于“又知道了新东西”的喜悦中,从而难以自拔。我丝毫没有看出这有什么不好。如果我们都是通过“知道新东西”的喜悦和刺激来了解其他学科,重构我们个性化的知识体系,有何不可呢?

我们的时代进步很快,大家在享受这个时代为我们带来方方面面的利

的同时,也在不断质疑时代为我们的生活所带来的林林总总的“弊端”。

有时,换一个角度来问自己:我们究竟在质疑什么,吐槽什么——其实不就是挑战传统模式的变革么?海量碎片化知识,是这个时代馈赠给我们最伟大的礼物,我们不能无视其存在,更不应该主动放弃,否则就是放弃这个时代。

在这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教师被逼上梁山,不管之前对于网络教学是多么排斥,这个时候也不得不学。老师本来是学习知识的楷模,这个时候更应该以学习新知,掌握自己未曾熟悉的内容而努力,为学生树立以身

作则的榜样。千万不可不动脑筋,指望别人告诉你最简单的流程。我们面对的是新问题。反过来想一下,如果学生都是这样处理问题,是你们自己喜欢的好学生吗?

在当下,学校尤其是大学能允许学生完全通过慕课在线学习并认可学生所获得的学分,那么,很多高质量的慕课涌现出来并成为最受欢迎的课程就指日可待。而且,大量低质量的线下课程将被淘汰,高校的教育形态,乃至整体格局也将脱胎换骨。这恰好是我们在“战疫期”,与传统作战、与习惯作战的战果。

(作者为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本版图片:视觉中国

# 在思想碰撞中寻求地平线外的洞见

小班化教学、讨论课近年来在不少高校备受推崇,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常面临各种挑战。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纽约大学的双聘教授吴冠军是“网红教授”,他的讨论课是中外学生“争抢”的“爆款”,每学期开学,等候名单的不断增加会持续好几周。但这位“网红教授”也曾经因为一根粉笔一个人讲整堂课而遭遇学生的挑战,也曾面对过只有八名学生选课的课堂,改变发生在他将学生文化差异和观念冲突变成了课堂教学的背景,让每一个学生都能从中有所收获——

■吴冠军

今年2月初,上海纽约大学的春季学期就在线开学了。上纽大从2013年8月正式招生后,每年都在新年假期期间就进入新学期。

上纽大建校至今的这六年多来,我的课堂上一共有过近五百名学生,来自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于我,最幸福的时刻是,收到很多学生毕业后发来的邮件,告诉我当年课堂上所学所获在其日常生活中带来的各种助力。其实,与学生共度的这些时光对我来说,同样是弥足珍贵的学习过程。

## 从一根粉笔的“一人堂”到一堂课36个人轮流讲

记得最开始在上纽大授课时,除了课堂语言切换到全英语,我基本直接沿用自己之前的授课实践——每堂课都是一根粉笔加一支翻页笔,我一个人从头讲到尾。但很快,这样的讲课方式就遭遇了全新挑战:课堂里学生们在文化、前理解、背景性视角、前提性知识储备上有着巨大差异。当我在讲课时,同一个问题,学生的理解却大相径庭。甚至会出现,我在台上眉飞色舞,而总有一些学生在下面不在焉。

因为,上纽大每年招生时,差不多国内学生一半,另一半面向全球招生——每学期我的课堂上还有大量来自纽大本部以及阿布扎比校区的学生。学生在文化与背景知识上的巨大差异,使得他们对同一个问题的理解千差万别。

这也“逼”我不得不很快就放弃一个人从头讲到尾的授课模式,而逐步探索“交互式课堂”与“差异化教学”的可能模式。

当我摸索着尝试把文化与知识之差异作为教学实践的基础而非障碍后,课

堂空间便悄然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改变:那种中心化的课堂(一个教师一堂课),转变成“行动者-网络理论”所描述的各行动者互相“触动”的“聚合体”。

在这种作为聚合体的辩论课堂中,传统意义上学生与老师的距离——空间上的距离、知识上的距离——被有效地截断与改组了。

老师不再是课堂里终极性的权威式人物,而是成为了议题设置者和问题提出者,换句话说,真正成为了一名“苏格拉底式”老师。交互式的辩论课堂形态,有效地促使学生不再是纯粹被动的倾听者。

而学生们在文化与背景性视角上的差异,恰恰给“辩论课堂”带来很好的起点。我课堂上限设置为30人,最多不超过36人,这样课堂上最多可形成6x6的“辩论小分队”规模。

## 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在课堂上享受“高光”时刻

每堂课持续两个半小时到三个小时,我都会根据授课内容精心安排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先让学生自由组队分组讨论,然后每组派代表呈现讨论结果,并在全班课堂上进行大辩论,有时甚至会出现一个小分队“单挑”全班的激烈格局。

学生们在文化与知识上的差异,从一开始就破除了课堂的同质化状态——面对各种具体问题,代之以同质化的共识——课堂上总是能很快产生分歧与多元声音。

投入讨论的学生们一开始都对“己见”自信满满,然而很快就会在辩论过程中,遭遇甚至频繁遭遇完全在自己视角之外的观点与论据(法国哲学家利奥塔所说的“歧见”)——它们来自同龄人,以及,来自老师。

置身这种课堂氛围内,学生们经常会在不知不觉中从热衷于表达己见,转变为渴望遭遇“地平线”外的各种全新洞见,并为听到意外见解感到欣喜——换句话说,就是被“歧见”所“触动”,并逐渐在叙说的同时学会倾听,进而真正享受倾听,进而在课堂上享受“高光”时刻。

身为一个大学老师,最美好的事不只是见证学生们在学习中的成长;同样十足幸福的是,课堂这种聚合体环境,让我能够不断处于学习状态。我在上海纽约大学不只在授课,更是在这个充满挑战与歧见的课堂空间中不断地学习授课,不断地去探索与开启教-学实践的全新可能性。

(作者为上海纽约大学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欧陆政治哲学研究所所长)

彼此名字,并且熟悉各自想法的“沟通共同体”。

由于上纽大课堂语言是英语,每学期最初几周,国内高考入学的学生们在课堂的辩论阶段,都无可避免地表现得较为“羞涩”。好在纽大本部过来的学生大多极具表达欲,相当热衷于表达和捍卫自己的观点,这就使得辩论课堂从一开始就不用担心“冷场”问题——美国学生毫无“羞涩”地投入讨论,能够非常有效地带动中国学生。

有意思的是,度过最初几周之后,中国学生反而是后劲勃发的那一群:课堂上经常勇于“单挑”多数学生“主导性观点”的,大多是尚带浓郁口音,但已去“羞涩”化后的中国学生。而小班化的课堂规模,则能够保证每个学生都会获得属于他/她的“高光时刻”。

## 建立在学生的知识背景差异之上的学习才真正有效

上纽大这些年的授课实践,使我越来越秉持如下这个学习理念:真正有效的学习,恰恰是建立在清晰了解自身既有的背景性知识与视角之上。

不同于中小学生的“白板”,大学阶段的学生并不是一块“白板”——他们带着各种背景性内容进入课堂。更关键的是,正是这些内容构成了日常生活中的学习,同时支撑与限制着学生的学习,包括对课堂上内容的实质性吸收。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把这样的背景性内容称作“前理解”,它们实质上构成了日常生活中的“偏见”。而法国精神分析学者雅克·拉康则把它们对应于在语言中形成的“无意识”——它们不被清晰地意识到,却恰恰在日常生活中具有着远远超过意识的支配性力量。

实际上,小班讨论课旨在收获的一个主要效果,就是使学生主动地捕捉到那些实质性影响自身学习过程的“前理解”——惟有在这一基础上,他们才能真正收获“知识增量”,也即,获得处在自己“地平线”之外的新的知识、思考问题的全新视角,以及各种各样能够开启新的思考点的点滴洞见。

上纽大的授课实践,也使得我特别敏感于学生的差异化需求——针对每次课堂上不同学生的文化背景与具体需求,我都会对授课形态做及时的调整,以满足学习者在视觉、听觉、表述乃至身体移动等方面所存在的习惯和能力上的差异需求。例如,我会在每学期开始对课堂空间做微调:根据每次不同的班级人数与教室大小(这些年来我的课堂经历过8到38位学生的幅度变化),对课堂空间展布进行调整,使空间和多媒体的设置能够最大程度减少信息传递和人际沟通之间的障碍,从而有效推动被动学习转化为主动参与,增强所有课堂行动者的交互性粘连,提高他们彼此深度“触动”的可能性。

身为一个大学老师,最美好的事不只是见证学生们在学习中的成长;同样十足幸福的是,课堂这种聚合体环境,让我能够不断处于学习状态。我在上海纽约大学不只在授课,更是在这个充满挑战与歧见的课堂空间中不断地学习授课,不断地去探索与开启教-学实践的全新可能性。

(作者为上海纽约大学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欧陆政治哲学研究所所长)

